



守望传统的价值（上）

■ 陈 来

2016年3月27日，“人文清华”讲坛第二场讲座在新清华学堂举行。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著名国学家陈来教授带来了题为“守望传统的价值”的精彩演讲。本刊分上下两期刊出全文，与读者诸君共享。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要分四个题目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是什么是传统？第二是如何看待传统？第三是传统与现代化，第四就是传统与当代中国。

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语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原文叫“世世传统”，世就是世代。在古汉语里，“传”是一个动词，是传延的意思；统就是统系，

就是一个连续关系之链。今天我们讲的传统这个词，并不是按照它的古意来用的。现代汉语里面“传统”是个名词，它的意义应该说已经吸纳了现代西方语言里英文 tradition 的字义内容，已经是一个新的词汇了。

在20世纪社会文化的话语里，跟“传统”相对的概念是“现代”。所以我们在20世纪的很多社会文化争论中，会频繁看到“传统跟现代”的讨论。上面我们讲的是语词，至于传统的定义，

我想引述一位著名的学者——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爱德华·希尔斯的一本1981年出版的专著《论传统》。在这本书里面，他对传统提出了几个定义性的理解，在全世界很有影响。第一，什么是传统？传统的定义，最广泛的定义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这个事物可以是思想、可以是精神，也可以是制度。接下来他给了一个界定，从过去传到今天，要传多远才能成为传统？是不是一定要传承800年、1000年才成为传统呢？他提的观点是三代。一个事物，只要人类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传承三代就可以成为传统。

然后，传统最主要的意义是指文化传统。比如说一个人学一门手艺，这个手艺也可以传递下去，这是一个很小的传统。像希尔斯在他的书里面讨论的，主要就是文化传统。

当然，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察，就是传统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发挥作用有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对传统的敬重。所以敬重传统是传统能够发挥历史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以上我们讲了语词和定义，现在我们要讲到，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传统？我想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文化传统应该有民族的属性。如果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化传统首先是民族的精神追求；其次，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血脉；再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所以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看，跟希尔斯的角度有所不同，我们强调文化传统跟民族生命的密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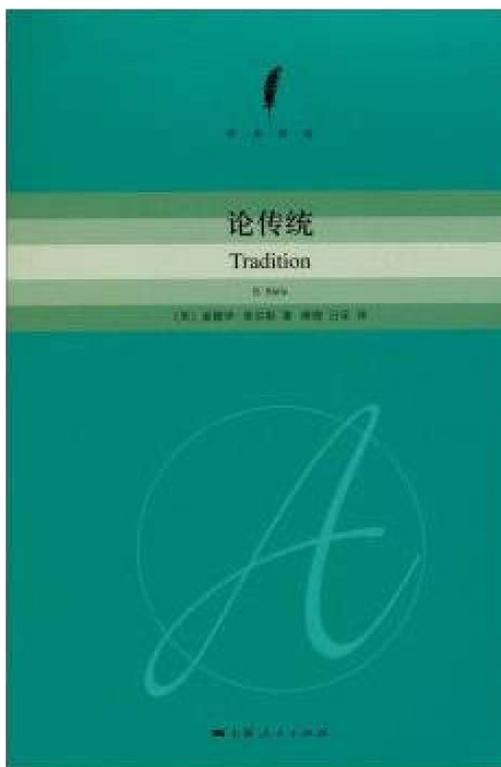
第二点，文化传统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有利于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文化的传承发展主要是靠传统来维系。

第三点，传统在一个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提供意义，而且守护这个文化里面的价值，塑造文化的认同。我想这几点，应该是我们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看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性的几点。

第四点，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它的价值体系。因为一个文化的价值体系提供给

这个社会价值规范、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理想，提供它最基本的价值观，这个应该是在文化传统里面占核心地位的。

以上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讲了我们对于文化传统的意义、地位和重要性的了解。大家可能说，传统有这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么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什么我们在近一百年来听到了很多批评传统、批判传统，甚至反传统，乃至全盘反传统的那些主张呢？而且这些主张相当流行呢？我想是这样的：传统并不是绝对圆满的，传统也是变迁的。在传统不断传延的过程中，有旧的东西衰退、退出来，也有新的东西不断加入。所以传统是跟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而人对传统的认识更是受到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和文化转型时期，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应该说争论更多。因为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和文化转型的时代，传统往往会表现出它的情性，因此就会被革新者、革命者视为历史的包袱，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陈独秀



《新青年》

这时就会使传统变成这个时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问题，引起大家很多讨论。

在这些讨论里面，像我刚才讲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五四以来，我们听到的很多对传统的这些议论批评，是不是都有道理呢？如果说它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涉及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应该说传统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在传统的整体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分析。所以在20世纪初，从1915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所发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传统文化所受的批判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明显的偏向，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把中国文化的传统全部看作历史的包袱，认为中国人只有跟他的文化传统做彻底的决裂，才能够走向明天。像这样一些观点应该说就走向比较激进和偏颇的方向了。

在有关传统的这些讨论里面，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在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些反思我把它归结为三个重要的误区，这些误区都是跟怎么认识传统、怎么对文化传统进行取舍有密切关系的，其中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认识传统、取舍传统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个误区就是以富强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代表人物就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领袖人物陈独秀。陈独秀主编了《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最初叫做《青年杂志》，最开始的时候陈独秀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是讲中西文化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怎么衡量文化的价值的。其中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最重要的要学习什么呢？就是以战争为本位，以鲜血书写历史。所以他那个文章里面说到法兰西的文明，说你看看整个欧罗巴的历史，没有一个字不是用鲜血写成的。他不是要控诉鲜血，他是歌颂鲜血。

英吉利的霸权怎么得来的？鲜血筑成的。他把这样的观点放在他对文化教育的主张里，就是要提倡兽性。他反对提倡人性、尊重人性，他提出的观点就是要“保存兽性”。这样的观点，我们今天看，觉得他是有为而发。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他要唤醒民众，所以发表了这样一番感慨的言论。同时他认为跟欧洲对战争和鲜血的崇拜、对兽性的崇拜相反，东方民族的特点就是爱好和平、爱好文雅，他把这个看作是东方民族的卑下的劣根性。我以前看了这个说法，觉得大吃一惊，怎么能把爱好和平、爱好文雅看作东方民族的劣根性呢？今天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和平、文明，应该说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积累下来的最重要的、对全人类都适用的价值。所以按照陈独秀的这种看法，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当时衡量中西文化的标准，就是以富强为唯一的根本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下，我们看到他评论文化的高低上下，用的是一个外在的功效的标准，而不是内在于我们人类文化的真善美、平等、友爱、和谐、和平的理想。他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到一个富强、鲜血、兽

性的坐标系里去衡量，所以得出了那种比较激进的文化结论，就不奇怪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误区。

第二个误区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以科学和民主作为判断文化的根本价值，或者唯一价值。刚才我们说陈独秀前面那个观点是在他《新青年》杂志创办初期的观点，到了1917年以后，他更多的是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扩充他的启蒙思想。用科学和民主来启蒙，我们觉得是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的。只不过在拥抱科学和民主的同时，我们看陈独秀对于传统的看法，应该说更加决裂了。当时五四时期的人把民主叫做“德先生”，德就是 Democracy；科学叫做“赛先生”，赛就是 Science。当时最流行的就是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要拥护“德先生”，我们就不能不打倒孔教、旧伦理、旧政治；我们拥护“赛先生”，就不能不打倒旧艺术、旧宗教。如果我们既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我们就不能不打倒国粹和旧文学。所以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



刻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五四运动”浮雕

国粹和旧文学，都在陈独秀必须反对和打倒之列。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用科学和民主整个地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和儒家，包括佛教跟道教，包括整个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艺术。陈独秀跟他的同事掀起了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六个对象。所以在陈独秀的这个主张之下，应该说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开始起了很大的影响，对大家的文化观，对怎么判定传统的优劣，到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起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科学、民主的作用和地位是有限的。像我们刚才讲的，文明、和谐、正义，甚至包括我们讲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这些文化都不属于民主，也不属于科学。可是在那个时代，他用科学和民主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的标准，得到的结论就是要反对和推倒整个古典文化，这个标准应该说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反思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讲中国的古典文学，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你说是科学吗？不是科学。你说是民主吗？也不是民主。难道它们就没有价值吗？像儒家所讲的这些道德概念，仁义礼智，像道家所讲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科学和民主作为唯一的标准，就无法确认它们的价值，就排斥对人文文化从其内在的价值来评判。这种认识方法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一直到文革中，我们讲“破四旧”，那种精神跟“五四”的那种批判态度都有一种精神上的影响联系。事实上文化遗产中包含的哲学、美学、伦理、文学上有普遍价值的成分不可能在科学、民主的典范下被承认。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从内在于人文文化本身的真善美来取得，因而“科学”、“民主”并不能成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误区。

第三个误区，除了前面我们讲的富强、科学、民主，用这个来判断人文文化、判断人文价值所得出的一些比较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结论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学者和知识分子缺少一个视野，就是价值理性的视野。价值

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它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对战后的社会科学界影响很大。价值理性就是着重于道德价值，就是重视道德价值的理性。工具理性就是着重于功效、效果的理性。理性在这里就是指的一种选择的主体。你对行为的选择是从道德价值去看，还是从工具效果去看，这是两种不同的理性的运用。在“五四”前后的这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有一个误区，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价值理性在近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只看到了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上传统受到的批评，比如说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对于西方的传统本身做的批评和反思。但是我们忽略了在整个近代化的过程里，其实西方的那个价值体系始终是保持着的，包括它所依托的宗教形式，在随着时代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传延着、支持着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看西方文明，要看它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是在近代只有科学和民主，而是有着伦理与信仰的传统的连续性，这个传统在传延着、支撑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

刚才我们讲新文化运动大家都最热烈地拥抱“德先生”、“赛先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有少数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个问题，说我们仅仅请了“德先生”、“赛先生”还不行，我们还要请一位“穆小姐”。什么是“穆小姐”呢？当时用中文翻译就是“穆勒尔”小姐，穆勒尔就是moral，就是道德。就是我们不仅要有科学、有民主，还需要有道德。新的社会有新的道德，决不能缺了道德的视野。这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始终还应该有一个观察近代文明发展的视野，就是价值理性的视野。

以上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如何对待传统。我们举出了在上个世纪，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它的三种主要认识传统的方法。而这三种方法应该说都是误区。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突出价值传统的重要性，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传统，也才能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